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宋学勤

[摘要]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 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 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 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 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 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 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 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取径民间, 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 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因此, 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 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 从而推动社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 当代中国史 社会史 学科建设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C91-09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952(2010)06-0029-09

新时期以来, 作为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 当代中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 并愈来愈呈现其“显学”之势,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些重要文献、档案资料和回忆录得到整理与发掘, 一大批国史专著、教材陆续问世, 研究论文数以万计。国史研究的体制化进程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与专业人才的培养陆续展开, 专业的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几年来, 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 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国史研究, 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 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背景下, 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 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中微观研究, 他们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取径民间, 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 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本文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 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试作总结评述, 以期推动当代社会史的建设与发展。

一、总体史的诉求: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改革开放以来, 国史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出现了“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

[收稿日期] 2010-03-08

[作者简介] 宋学勤, 历史学博士,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100872。

* 论文系 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DJ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同时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培育计划项目(10XNJ018)的支持。

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的格局”^[1]。张星星分析这种状况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最初是从中共党史的社会主义时期研究中分化出来的,因此,研究中存在着过多地集中于政治史研究,偏重于国家的重大决策等倾向”。^[2]事实上,这一状况在2001年时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上,在讨论国史研究的视野问题时,就有学者提到了国史研究在社会史领域的拓展问题。^[3]如杨凤城指出,国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要注重社会各阶层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只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群体的影响,普通个人的动态,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4]针对近几年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之势,田居俭专门撰写了《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一文,极力呼吁加强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因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当代社会史研究是个亟须填补的空白。^[4]张星星亦同样倡导,“我们今后将进一步拓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视野,加强对社会生活等薄弱领域的研究,突出国史的‘通史’特点,更加全面、更加生动、更加多彩地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图景。”^[2]

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的关系最近两年也成为学界热点^①,很多学者努力跳出传统研究中国史与党史不分家的误区,竭力摆脱政治史范式而进行新领域开拓的努力。如在强调二者之间研究内容的区别时,有学者论证道,“社会领域里的某些变迁,例如人口、婚姻、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乃至语言的变化等等,尽管与中共党史或多或少地也有一定关联,党史研究也会有所涉及,但却不可能专门研究”,但是“这些对于国史研究来说,不仅是研究的,而且是必须着力研究的”。^[5]这些来自国史学界的声发人深省,反映了国史研究的总体史诉求。所谓总体史意即全面的历史,是指全面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②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既代表了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学人的总体史诉求,同时又为深化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即为拓展研究领域、填补国史研究中的盲点,提供一个较为宽阔和相对全面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层面,亦有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当其时。因为“从中外史学研究的运行轨迹考察,大体上总是政治史先行,经济史和文化史接踵而至,社会史最后登场”^[1]。国史研究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都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现实社会的发展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转向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新世纪新阶段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而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

① 如李向前的《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齐鹏飞的《关于“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朱佳木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

② 年鉴学派史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中对所谓的总体史进行了一番提纲挈领的概括:“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

不仅必须，而且也正是“社会史研究中题中应有之义”^[1]。

二、国史研究的社会史空间

诚如有学者所论，“当代社会史研究思精体大”，不仅“大有文章”可做，而且“有大文章可做”。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中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向，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具体而言，依笔者的理解可以有以下努力的方向：

（一）社会结构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全体社会成员均以制度化的规则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种地位规则，界限明确，一般不能根据个人意愿自由更改，甚至有的是与生俱来，在人的一生中若无特殊情况不会变化。^[6]其中阶级身份、户籍身份与就业身份制约着社会成员的发展，阶级身份对社会成员的就业、通婚、入学、入党、参军等地位晋升和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有着城镇与农村的明确区分的户籍身份对个人及社会的流动性起着较大的限制作用，干部、工人和农民的就业身份使社会成员在收入和地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社会阶层是根据身份不同进行划分的。其中社会成员的户籍身份即户籍制度的变迁在新中国社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由于户籍身份的划分，城市和乡村成为高度封闭的两个社会和经济单元，在这种城乡分治的行政建制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稍有改变，但计划经济时代留置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因此，认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也是社会史研究应致力的主要方向。其中首要考察的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的。这就要客观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诸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等集体化时代的运动，以及新时期以来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影响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此同时，还要仔细寻绎城市的单位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单位制度涵盖了一个城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一种制度体系，同样也能个性化地规定着人的具体存在方式。在此过程中，家庭、宗族、社区、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变迁都是要着重研究的对象。

（二）社会生活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面 60 年来社会生活的演变，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细心探究，1949 年以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变迁无不体现了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如新中国头七年社会生活的变迁就是一个显例。1949~1956 年是社会制度变迁最为迅速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社会制度产生两次巨变：新中国进行了农村的土地改革与城市的民主改革，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经过三年的时间，又全面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变革的重大目标，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稳定、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威，并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框架。新的制度框架，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与效能，借助这种强大而普遍的政治权威以及计划体制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建构起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管理制度，并自上而下地作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一切社会生活皆被纳入到国家设置的制度逻辑之中，使新中国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改天换地”。系统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的衣、食、住、行等

日常生活的“小历史”演变是可以透视“大社会”的发展轨迹的。

(三) 社会问题的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独立, 赋予了中国社会健全的国际人格, 从此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转型时期的结构转变、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等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政权一步步践行自己的社会理想, 实行社会改造, 加速了社会转型。其间引发的社会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结构性社会问题。它是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 由于某些制度性、政策性的因素引发的, 往往带有全局性和普遍性。如人口问题、失业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等。二是变迁性社会问题。这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伴生物, 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生态平衡与环境破坏问题等。三是越轨性社会问题, 它主要是由个人或集体行为偏差而引发的, 这类问题因直接危及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人们反应最为强烈。如黑恶势力、偷盗问题等。四是病态性社会问题, 主要指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那些畸型、丑恶的社会现象。如黄、赌、毒等。五是心理性社会问题, 即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而引起的心理负荷加重和心理震荡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焦虑现象弥漫、自杀率上升等。社会问题是一种消极的社会事实, 对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问题总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认真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对策, 可为我们提供经验借鉴, 从而把社会问题的消极、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治理娼妓问题, 是“用最短的时间、创造的整治最彻底的社会奇迹”^[1]; 祸害中国 200 余年的烟毒问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解决, 1953 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可以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病态生活的社会控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很多经验至今仍可资鉴。

当然, 其他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也有待研究, 如对社会心理的研究, 从分析社会意识、社会信仰的变化入手, 深入探讨民众的文化与生活, 从民众心理、信仰的转换来揭示社会历史的变迁, 等等。这些都是当代社会史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

总之, 从社会史视角来观察 1949 年以来的中国, 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三大板块方面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从这三个方面来系统分析当代中国社会, 对长期以来被史家忽视的社会史角落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城乡差别、人口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病态性社会问题等专题的研究, 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社会各种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

三、“从小社会入手”的方法论意蕴

“当代社会史千头万绪, 如何落实?” 为此,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 “从小社会入手”。依笔者理解, “小社会”意指“大社会”的生活基础, 即普通人的社会生活, 亦谓微观社会。检讨社会史研究的历程, 可以发现存在着两种对比鲜明的史学路径即广义的宏观社会史与狭义的微观社会史。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对微观社会史的研究。对于微观社会的内涵, 不同的学科理解不一。在历史学那里, 微观社会就是指常态的(日常生活)历史或局部的(区域性)历史。微观社会史的开展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史学领域的渗透有着极大的关系。当然, “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7]在蓬勃开展且已取得较大成绩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有很多成果是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与史学工作者的联袂之作。

而对 1949 年以后的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目前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从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较早对当代中国社会开展研究的是瑞典人类学家简·迈德尔。他于 1965 年出版了《一个中国乡村的报告》作者 1962 年秋对陕北地区柳林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将土地改革、婚姻法的颁布等制度变迁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变化进行了民族志书写，详细记述了柳林村村民的生活变迁。1973 年，迈德尔又出版了《中国：继续的革命》一书，用人类学家的手法回答了“农村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构建了一幅乡村社会生活变迁图景。^[8]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作者从 1978 年 5 月至 1991 年的 13 年间，对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研究的一本专著。该书集中阐述了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一个普通村庄在革命与改革时期的发展历程。^[9]台湾人类学者黄树民出版了《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通过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个人经历，讲述一个村庄 1949 年后的 35 年的社会变迁。^[10]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的理论架构研究了浙江北部的普通村庄联民村，解释了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践逻辑，分析了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之间所存在的张力。^[11]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的《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是在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 1925 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的基础上，对广东省潮州市的凤凰村进行追踪研究的成果。该书通过考察凤凰村的社会变迁，指出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凤凰村发生变迁的外部因素，而人口、宗族、信仰等是变迁的内在因素。^[12]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3]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郭于华主持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该计划选取了河北、陕北、四川和东北的 4 个村子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并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①。应星的《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中国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注意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把权力关系和权力实践置于有关“身体”的日常生活事件中，分析提出“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通过各种复杂的技术和策略，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在不断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本身”的观点，^[14]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关注乡村日常生活的变迁。它们大多是以微观的区域为个案或者说以“社群”、“社区”为单位进行研究，尽管有的研究成果采用口述历史的形式，但其理论与方法都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路数，不重视历史的线索或脉络，但这些成果在学界影响较大。

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是笔者仅见的一部从历史学路径研究当代社会史的专著。^[15]该书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心理为分析的入口，从不同侧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活诸方面演变的图景，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社会重建的具体内涵。另

① 如《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骠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期。

外，史学界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涉及了人口流动、医疗卫生、弱势群体救助以及娼妓、毒品、乞丐等社会问题，且大多都断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中国知网所做的下载量和引用率的统计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却为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已悄然兴起，其规模之势亦指日可待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几年的博士、硕士论文中出现了政治—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即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观察、理解政治史。而且受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影响，一些青年学人的研究成果明显地体现了区域化取向的旨趣。以当前国内外学界都特别重视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例。以往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跃进”的发动、进程、发生原因及评价，近年来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不少学人开始关注其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特点，以区域为单位，选取一些典型个案来进行考察。如《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根据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紧紧围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背景，对“大跃进”运动在山东省寿张县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详细考证和梳理。作者通过对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旨在揭示“大跃进”运动在基层的推进过程，而在此过程官方活动与基层干部、群众的活动的互动，对“大跃进”运动高潮的到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因此，作者侧重于详尽考察重大政治和经济运动在一个县级行政区划的演进过程，基层乡村社会的贯彻落实；侧重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互动；侧重于上层政策与下层民众的呼应。试图反映下层民众在一个全国性政治运动中的参与状况与影响，为我们全面理解“大跃进”运动提供了重要参考。类似的研究成果颇多。^①《从麻城县看公社化的ABC》^[6]以县为个案分析农民的一些对公社制度的抵触行为，如唐郁公社一度出现“五多两低”^②。《大公社时期农民的“反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南平地区为例》同样从普通农民日常生活入手，以农民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偷”粮、瞒产私分、磨洋工、黑市交易等“反其道而行的行为”为研究对象，指出由于大公社时期的制度安排难以满足农民的实际诉求，侵害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所以农村存在着大量针对公社制度的日常反抗行为。进而对农民“反行为”的功能进行分析评价，指出农民“反行为”既缓解了农民极端低下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对国家政策的修订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7]从事农村人民公社研究的学者辛逸指出，近20年人民公社的研究大都是“自上而下”地审视、研讨，热衷于追述和分析中共中央对公社的每个决策的前因后果，以为中央的决策在各地会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会理所当然地决定着所有公社的所有方面。而没有注意到中央的决策到了地方几乎都会走样甚至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中国传统的“宏大叙事”难现各地人民公社的真实，为此，他提出将中央决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研究理念。^[18]

在上述博士、硕士论文的绪论中，作者都十分明确地指出研究“小社会”的目的是为全面认识“大历史”提供参与与重要佐证，是一种从纵深处研究历史的努力。他们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以“点”窥“面”，具有视角转换和方法论的意涵。他们所进行的地方史研究，既不同于地方志的编纂，亦不同于传统地方史的撰写，史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地方发掘资料去认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这几乎

① 马龙虎：《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3级博士论文。类似的博士、硕士论文还有一些。

② “五多”是指害病的多、上街的多、走亲戚的多、上学的多、怀孕请假的多。“两低”是指出勤率低、生产效率低。

成为社会史学界的共识。如有学者认为，“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体系。”^[19]由此而言，宏大叙事视野下的国史研究在具体到细节、具体到国家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具体到下层民众的研究，则可能失之于欠缺和笼统。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化取向的研究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把国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国史领域开展社会史研究不是撇开政治，也不是弃重大政治运动、历史事件于不顾，因为“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20]。

要而言之，从“小社会入手”的方法论意蕴即在于遵循“自下而上”的视角和总体史的旨趣，把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安排与具体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以社会生活为切入点，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从而深化与完善国史研究。

四、余 论

综上，国史研究的社会史空间很大，学界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也很多。受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愈来愈多的学人把空间维度放在了其学术视野的首要地位，热衷于个案研究与田野调查。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学人关注点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社会建设运动上，诸如土地改革、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地方表达。显然，对这些运动的研究需要沉潜地方，进行细致的史料挖掘，才能更准确地呈现国家大政方针在地方社会的表达效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学术视野，这种发展路向无疑是应当肯定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想只停留在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机关公布的统计资料上，而试图从地方档案中获取信息来研究历史。他们认为通过具体而微观的地方资料或个人资料才能全面评价异常复杂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以及通常隐藏在总数和平均数中的千变万化的特点，以看清历史全貌。这些道理在理论上是很讲得通的，但是具体实践效果呢？会不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罗列现象、不揭示本质的‘碎化’和浅薄呢”^[1]？会不会违背社会史致力于整体开拓研究的总体史目标呢？

在一些崇尚微观社会史研究的学人视野里，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对具体而微观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则笃信不疑，研究的目的则是在试图挑战、动摇一些宏观历史认识。但孰不知过细的微观实证也容易出现偏差。如果过分迷信“小地方”和单纯的田野材料的说明力量，以“国家—（地方）社会”对立的二元观，根据微观社会研究简单否定宏观历史认识，而不去考虑微观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这样的研究易于以偏概全，恐怕离历史的真相更远。实际上，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单元选择方面出现了极大的自由性，有跨省区的大区域史研究，有省区史、县域史研究，更有乡镇史、村域史研究等等。几乎没有可以相对认同的标准，研究的“区域单元”可以无限的细分下去。不知有多少学界前辈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抽样作证”，中国地域广阔，多样化的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局部性的观察，搜罗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21]如朱佳木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有的错误是普遍的、全局性的现象，但有些运动，错误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

虽然也存在侵犯中农利益、冲击富农经济、对地主体罚的现象,存在打“老虎”凑人数、对“五毒”界限不清等扩大化现象,但这些并非普遍存在。^[22]所以我们在进行区域空间选择时,首要考虑的是研究对象的空间特征,而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地域化或地方化,以抽绎出个别性的结论来代替一般。个别虽可以反映某些一般的特征,但个别毕竟不等于一般。特别是有些研究取样较少,到某一地方去寻找一些“特殊现象”,而以之为据大加发挥,动辄就得出一些颠覆性的结论来,号称要改写历史等等,殊不知“特殊现象可能偶然有之,不是群像,在历史发展潮流中不占重要地位,若是过分注意他,反而迷惑读者,甚至也可能迷惑自己!”^{[22](p.27)}因此,通过个案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不宜机械地推广到一般中去,需要谨慎地思考和分析,以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3]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所进行的林村、李村、岳村、联民村等以村庄为个案的乡村社会研究做得很出色,在学界影响很大。但问题是,在了解了上述各村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之后,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具有概然性的历史认识?显然,我们得不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他们的初衷不在此。人类学学者王铭铭指出,“社群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24]而历史学的意义是不能止于此的。

因此,在当代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仍需提起注意的是跨学科研究对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能够拓展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其研究途径,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应用不当又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学科的重心位移,使学科自身丧失主体地位,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25]这正如有学者所论,“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注重田野调查的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把人们的视线更多地引向作为田野调查对象的微观社会……这对于厌恶了‘宏大叙事’的空疏学风、注重人文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的当代学界来讲实有重要的正面价值,但是毋庸讳言,这种专注于‘非国家的’微观社会的视角本身就是以社区、村落、家族等等的内在凝聚力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而如果要对这种前提本身进行审视,这种微观视角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所谓凝聚力的有无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更大范围的视野提供的横向(不同文化间)与纵向(不同时代间)的比较,所谓的国家权力也好,宗族村落的自治也罢,都只能是说有即有、说无亦无了。”^[26]这段话发人警醒!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必须立足于历史学本位,坚持为“我”所用。盲目地去追踪“学术时尚”只会丧失自身的学科价值,倘若如此,也许就会出现巴勒克拉夫所预言的:“这样的历史学无疑还会受到尊重,而且非常流行,但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7](p.69)}

[参 引 文 献]

- [1] 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 [2] 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 [3]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4] 杨凤城:《关于国史研究的视野问题》,《光明日报》2001年7月10日。
- [5]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 [6] 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 [7]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 [8] 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 [9] [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10] 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 [11]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中心出版社1998年版。
- [12] 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 [13]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
- [14] 应星:《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中国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 [15] 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16] 王燕妮:《从麻城县看公社化的ABC》,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04级硕士学位论文。
- [17] 刘捷:《大公社时期农民的“反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南平地区为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08级硕士学位论文。
- [18] 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 [19]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20] [英]哈罗德·铂金:《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 [21]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 [22] 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 [23]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 [24]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
- [25] 宋学勤:《跨学科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前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 [26]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杨文利]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No. 6, 2010**

ABSTRACTS

*** Special Contributions***

Strengthen 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and promote National Rejuvenation

..... Chen Kuiyuan (4)

Study and Compile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Marxist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You Lin (9)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et straight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studying and compiling history books. However, historical facts alone cannot make up a history book for viewpoints are indispensable. Viewpoints are reflect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hoices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in the analyses of them, which depends in the final analysis on the author's stand.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this in modern or ancient time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refore, in studying and compiling history books we must take the Marxist stand and keep to the Marxist viewpoint and method.

Keywords Marxism, stand, viewpoint, method, national history

*** The Tenth Annual Academic Meeting on National History***

Enhanc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and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Opening Speech at the Tenth Annual Academic

Meeting on National History Zhu Jimu (16)

Address at the Tenth Annual Academic Meeting on National History Xiao Zhiheng (19)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Fully Affirm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C Li Jie (21)

Closely Cooperate and Scale New Heights Duan Bingren (23)

Academic Summary of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n National History

..... Zhang Xingxing (24)

Social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Song Xueqin (29)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and scor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period. Over recent years,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has appear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studies of social history that stands side by side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ies and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with a holistic point of view. This impl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academic evolu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uggests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imes to agree with the external social reality. In this context of development, a number of national history scholars hav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to micro solid evidenc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micro research at the local and social levels. The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xploration and sorting out of local historical data, take a folk approach

and take a region or a locality as a case for empirical study, trying to grasp the “tot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the local or regional history.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with the method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thu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iscipline of social history.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ocial histor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methodology

Changes in the Four Villages o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over the Past 80 Year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 Sun Qingzhong & Zhang Rong (38)

Abstract The four villages o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investigated by Li Jinghan in the 1920s have long since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We conducte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se four villages from 2006 to 2008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our predecessors and, with th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of villagers as the thread, to depict the course of conversion of the villages from rural society to city blocks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landless peasants in their endeavors to adapt to urban life. As a link joining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villages on the fringe of cities are both the forward area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ocal points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ising from urbanization. Therefore, restudies of the four villages o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not only extend the history of these villages, but also turn the spotlight on the valu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cording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Keywords Li Jinghan, the four villages o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rural people, society, urba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Socialization of Disaster Relief in New China

..... Jiang Jiwei (46)

Abstract Socialization of disaster relief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apping more relief resources under the government-led disaster relief system for it is able to best solve the problems left over by the government relief work and optimize the results. China has traversed a tortuous path in socialization of disaster relief work since 1949 an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disaster relief pattern with the government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and individual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aking an active part. However, the mechanism to ge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disaster relief needs to be improved. At present there are not many avenues for them to play their role and their work is limited basically to mobilizing the various social sectors to make donations, leaving a lot of latent potentialities to be brought out.

Keywords New China, disaster relief, socialization

Overseas Chinese and Deliberations, Legislation and Promulgation of

the Anti-Secession Law Zhu Qingsheng & Zhan Shanqin (52)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whole course of deliberations, legislation and promulgation of the Anti-Secession Law a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overseas Chinese put forward very early on the proposal to curb “Taiwan independence” by the legisla-